



孫慰祖論印文稿

上海書店出版社



孫慰祖論印文稿

上海古籍出版社

孫慰祖論印文稿

上海書店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孫慰祖論印文稿/孫慰祖著, —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9.1(2000.5 重印)

ISBN 7-80622-414-9

I.孫... II.孫... III.古印(考古)-研究-中國-文集 IV.K877.6-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17401 號

責任編輯 陳其瑞
特約編輯 張晶
技術編輯 毛志明
裝幀設計 柯國富

孫慰祖論印文稿

著者

孫慰祖

出版

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書店出版社

發行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印刷

上海財經大學印刷廠

開本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開

十六開 二八·七五印張

版次

一九九九年一月第一版

印次

二〇〇〇年五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

二〇〇一—三〇〇〇冊

定價

一一六圓

自序

收入這本集子的，是我十五年中陸續發表的有關印史、印藝研究的大部份文稿，也包括不少旨在普及的介紹性文字和隨筆。

這些文稿，有的是自己想寫的，也有是熱情的編者朋友讓寫的。人有情性，我們不能免俗。沒有朋友們的命題作文，恐怕相當一部份文字就不會產生，這本文稿涉及的方嚮和範圍也不會如此龐雜。涉及較多當然還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印學和篆刻的範圍內引起我感興趣的問題實在不少。多年來，不斷有一些新的論題在心中轉悠，時時撩撥起我窮源竟委的興致，有時甚而漫無涯際。我曾經問我的女兒：

「願不願意接着做這些事？」她很干脆地回答我：「不！」其實我也未必真希望她一起跟進，父子授受藝術和學術的結果大多難以避免近親嫁接的那種規律。彼此失去了距離也往往失去了誘惑。自己幾十年來樂也因此苦也因此，中了魔似地無怨無悔，完全是一種偶然。何況兩代人面臨的外部世界如此不同。不過這樣的回答，多少使我有些感慨。

我曾在五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談到：現代階段上對於印學的研究，儘管一直有人在陸續地做，但相當時期內始終是一個很不景氣的領域。無論相對於書學還是畫學而言，都顯出

明顯的失衡。這一狀況的形成，除了衆所周知的社會因素之外，研究資料的稀見匱乏足以導致在這一學科中每深入一步都顯得十分艱難，沉進淒清冷寂中苦苦尋覓未必期在必得。

學術是板凳須坐十年冷的活計，而關注於技自然比求諸於道更容易落到實處。更深層的因素則在於：宋元以來篆刻被認可的根本上是一種「游於藝」的自娛價值，古璽印也主要因為它的賞玩意義而被廣泛接受。儘管對後者的考釋，可以上溯到宋代，但作為學術學科的意識顯然缺乏深厚的歷史傳統。這一點，雖然與書畫有相似之處，但印學因其接受面的狹窄顯得更為突出。十年動亂結束，我國社會進入新時期以來，隨着文化背景的轉變、相關學科的迅速發展和書法篆刻創作熱潮的興起，對兼及文物考古和藝術的印學研究及其理論提出了迫切的發展要求。這種要求意味着什麼，真正關注斯道而且涉足其中的同仁是感到了具體的分量的。羅福頤、方去疾、沙孟海等一些前輩學者在這一時期率先奉獻了一批他們數十年苦心孤詣積累的研究成果，初步勾勒出對於古璽印、明清印人印派和篆刻史研究的比較科學而具學術性質的認識框架，他們的方法和成果更具有當代印學的啟蒙意義，使至今活躍在這一領域的中青年學者都受到了霖潤。

這一時期文物界、古文字學界對璽印斷代、古璽印發展史和璽印文字等方面的研究爲印章史料的利用、中國印史的準確描述和璽印文字釋讀提供了大量新的信息和結論。就篆刻界而言，以八十年代前期韓天衡編訂《歷代印學論文選》及若干論文爲標識，同時和隨後有着衆多中青年研究者投入的篆刻史和篆刻藝術的研究、普及所帶來的社會影響，是過去任何時期難以比擬的。傳統積累相對較爲豐厚的篆刻審美和創作技法理論，在新的歷史時期更有所延伸和深化並逐漸體現出現代的色彩，部份地置換着長期因襲的體驗式表達形態。總之，近二十年中，無論對於古璽印和古璽印史、文人篆刻史和篆刻藝術的研究，都積累了不少具有突破前人、聯接缺環意義的學術成果，表現出前修未備、後學轉精的態勢。一些學者研究所指嚮的廣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研究的方式隨之出現變化。而後者的意義尤其不容忽視。

當然，人們在樂觀之中依然十分清醒。因爲無論我們對於印學的外延作出或大或小的界定，印史和印藝的研究及其理論闡述總是它的基本塊面。而在這兩方面，作爲學術的意識和真正切入學術層次的研究現狀仍然與人們期望的建立學科體系的要求未能充分適應。印學的研究對象包括印章，而印章尤其是古璽印的文化內涵和史料意義却超出印學之外，它所涉及的包括古文字、民族古文字、古代官制、歷史地理、民族關係等學科範圍，因而它並不能僅僅從篆刻的視野出發和僅僅由篆刻界獨立承擔。我們不能不承認，當代印學作爲一門邊緣性的學術，它還只是形成中的幼稚學科。作爲這樣一個學科體系的構築，至少文物考古界和篆刻界須要聯

手作出群體性的較長時期的努力。

對於相對產量較高的普及形式的工作，它們的社會意義不能低估。篆刻藝術創作在當代的空前繁榮和一些熱衷於印學探索的人才的湧現，是其意義的直接體現。這一部份工作也是當代印學的一項嚴肅任務，同樣也需要去做。但由於前述的理由，我們對目前這一部份工作的科學性和準確性自然同樣難以估計太高。這也反過來對印學的基礎研究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

如果這樣的看法大致符合實際，而不要求全面、全面評估當代印學現狀顯然不是筆者這篇小序的任務，那麼，說我們仍然有太多的事可以做並不是故作高深之談。

我們當然不會有這樣的奢望，自以爲可以承載多少驚世的工作。任何個體的研究質量恐怕都不能超出一個階段所能提供的外部條件的限制。但衆多個體積累的總和却是可以超越以往的。這樣的估計就會將自己的工作目標確定在比較恰當的位置。對我個人來說，未知的和不滿於現有認識的問題太多。求新知的趣味便成了處處留意新材料新結論的原動力。探求過程中的期望和獲得真知的慶幸都是一種喜樂無窮的事情。在這個都市相對僻靜的邊緣，在離開喧騰紛雜之後四周一片寂靜的夜晚，進入一個人的世界，面對古人所遺的古光片羽，思緒自由暢達地尋找與歷史的內在邏輯相對接的綫索，有時輾轉反側而不得，有時豁然開朗而洞明，實在是令人滿足的。「偶有文章娛小我」，至於其他的許多東西，常常覺得是無可無不可的了。

我這些年所作的幾個研究性的題目，大多是有意識地選

擇了長期令人困頓而又缺乏現成系統資料的問題。由於上海博物館豐富的歷代璽印篆刻典藏和良好的資料條件，加上工作中接觸到的各地新發現的材料，對我的研究來說無疑如魚之得水。同時這也使我感到一種深沉的壓力，因為面對着先人這樣一份豐厚的賜予，我們無法冷漠和沉默。這樣的條件當然又使我的工作形成了某些特點，那就是從充分佔有比較系統的實物資料出發的研究方式和涉及面相對較自由的課題目標。如有關古璽印若干時段的鑒別斷代研究、形制學研究、璽印文字的史料研究、以實物為主幹的流派篆刻作品、作家研究等。再一個就是比較集中地進行了若干類別和個體的璽印、篆刻資料蒐集和整理工作。我一直感到資料的蒐集和合乎學術研究要求的整理仍然是印學範圍內需要繼續完善、填補的一項基礎工作。這雖在相當程度上屬於「存古」性質，但今天的認識條件已與舊金石學時代大不相同。整理的結果往往導致新的結論，整理的方式和角度當然也會融入新的學術觀念。我先後完成的古玉印、兩漢官印、西晉官印、封泥、宋元印章和董洵、巴慰祖父子、黃士陵、徐三庚篆刻的彙集整理，也是屬於這一性質的過程，文稿中的若干篇章即是上述工作的結果。由此發現的一些結論、信息也並非局限於印學和篆刻範圍。因此，這部份工作的意義便不僅僅在於提供後續研究的便利，它同時也成為自己探索的課題。作為一個印人，並且一段時期兼着篆刻藝術的教學，思考印章藝術審美語言和創作規律也是我感興趣的所在。這方面的文字，大多從普及教學和拾遺補闕着眼，與印史方面的一些題目一樣，都有很大的跳躍性和隨意性。

這樣，有時冷靜地估量，古璽印的研究和文人篆刻的研究，每一塊都足以使人投擲全部精力而猶感不足，一些前賢的研究定位自有其理由。游移於兩界之間的結果可能哪一翼都不發達。那麼，這些年中所做的種種工作，真似乎有點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味道了。又轉而想想一些一不小心便博大顯彰起來的朋友，更是自慚形穢。這個狀況，既與自己的潛質、機緣、行為方式有關，也和印學的現實有關。

因此，這些日常工作 and 整理編集資料之外的間隙所寫的論印文字就大致反映了在這樣一種狀態下，我對印史、印藝等方面一些問題的認識和思考，無論問題的提出還是問題的解決我都深感綆短汲深的窘迫。但是，不管就個人還是整個學科而言，階段性的認識和工作都祇是無限長河中的一部份，需要時間來篩選。盲目的自信和自卑都無必要。說到底，當着這一領域科學的研究體系真正完備起來的時候，再來反觀現階段各方面探索者艱難的交替、醞釀、鋪墊等一切努力，其意義和價值成分才會看得較為清晰。一切浮華和附麗終將如潮水退去。自然，這本文稿中的一部分東西，也將會是速朽之物。

這就是我終於彙集這本文稿時的想法，我期待着大家的指教。

這本文稿，不少內地發表的篇章引起過一些人抄錄並作為他們的觀點、發明，再次發表甚至拼湊成書的興趣。每讀到這些東西，常使我頗有一種似曾相識燕歸來的親熱感。在國外，引用率的多少也被看作是文章價值的標尺之一。但是，在還比較缺乏學術規範（這也是咱們這個幼稚學科的表

現之一」的印學、篆刻圈子內，這些「引用」却有自己的特色，這就是：數以十計的各種層次的「引用」者成百上千字的「拿來」，却没有注明所由何來的習慣，這種登高去梯的勇氣使我欽佩。由此又想到一位同道在不久前的一次書學座談會上所呼吁的建立學術規範問題。印學、篆刻學要真正推向學術層次，形成良好的學風和學術規範，恐怕是一個重要的前提。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日於可齋燈下

目錄

自序	1	漢代的匈奴官印	80
西周璽印的發現與璽印起源	1	古印記異	82
古陶瓷印述略——兼論璽印的早期形態	4	台北故宮藏印	92
古印、封泥釋序辨正	9	戰國秦漢璽印鈕制的演變	94
「司丞」試釋	13	延津劍合話雙印	107
璽印辨偽舉隅	16	有靈開地藏 無意得天章——新出漢晉金銀印散記	109
新莽西海郡兩印考	20	漢晉黃金官印漫話	112
石洛侯金印鑒真	22	西晉官印考述	116
「歸義長印」不偽	25	古玉印概述	136
西漢官印、封泥分期考述	26	古印中所見的蛇	144
陽羨新出秦漢官印考	60	中國古代封泥研究——《古封泥集成》代序	146
新獲官印考釋兩則	62	若干唐官印的考釋及相關問題	167
朝鮮半島出土的漢魏時代封泥考	65	元八思巴字私印研究	171
新見秦官印封泥考略	67	上海出土元明石章及其印學意義	183
新發現的秦漢官印、封泥資料彙釋	71	以石爲印古已然	186
漫話漢魏官印的印工風格	78	談談古璽的藝術特色	188

漫話中國璽印文字的發展	190
璽印的文字之美	192
漢印的印史地位	196
略論「爛銅印」的審美意義	198
古璽印欣賞漫筆	201
印章簡史	231
漫話印學的形成與發展	233
印章辨偽與鑒定淺說	236
中國印章材質簡說	239
鑄印與鑿印	244
方寸之地寓巧心——漫話印鈕藝術	245
印章藝術的歷史長廊——關於中國歷代印章館的答問	248
中國歷代印章館展品鑒賞札記	252
出土明代甘暘手刻玉印小記	276
汪關遺印漫記	278
董洵研究	280
巴慰祖與潘慰祖	291
關於巴慰祖父子的篆刻風格——兼談歙派印風	292
似曾相識燕歸來——新見浙宗遺印鑒別記	297
「覃谿鑒藏」印真偽辨	299
「大好山水居」作者小考	301
徐三庚印風的形成及其特色——《徐三庚印譜》代序	303

關於胡鑣別號的幾則新資料	306
新見吳昌碩遺印鑒真——兼談吳昌碩的篆刻風格轉變	308
新見吳臧堪遺印及其他	312
論黃士陵——《黃士陵印譜》代序	315
新見黃士陵印石七方	318
《圖雲書屋藏印譜》小考	320
新見明沈潤卿刻譜考	322
——兼論《漢晉印章圖譜》與《吳孟思印譜》	322
丁敬與西泠印派	327
歙四家與鄧石如派	330
徐三庚與趙之謙	333
胡鑣與黃士陵	336
何震與「笑談間氣吐霓虹」	339
鈿閣女子遺印	341
戴本孝刻冒襄六面印	343
丁敬的六面印	346
陳簠齋與「伯寅寶藏第一」	348
黃易和「小松所得金石」	350
「龍尾山房」印與龍尾硯	352
吳熙載與趙之謙的一段印緣	353
康有為自用印小考	355
清代名家竹印掇珍	357

明清篆刻邊款藝術概說	359
談談篆刻與篆刻的學習	362
論篆刻創作的文字組合	364
篆刻構圖的基本規則與形式	367
談談印文的排列與印形變化	371
篆刻創作的「做意」	373
談談印款的文字內容和形式	377
鈐印心得	383
篆刻構圖形式及審美	385
治印札記	417
創作隨想三則	419
附錄	
歷代篆書藝術漫談	420
大克鼎銘文的書法特色	426
秦漢金文概述	428
後記	441

西周璽印的發現與璽印起源

中國印章起源於何時？它的最初功用是否即為權信？這是兩個相關而又並非全新的論題。儘管近幾十年來不少學者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衆說紛紜的狀況仍然未有決定性的改變。

影響廣泛的是「戰國起源說」。羅福頤先生曾提出「傳世古璽印是戰國至明清上下二千三百餘年的遺物」，「其中或雜有春秋時代的遺物，然今天尚無科學的證明。」（《古璽印概論》）稍後，葉其峰先生編《故宮博物院館藏肖形印選》，確認兩枚圖形璽為西周至春秋時代，較之羅說有所前溯。篆刻界相沿至今的一般說法仍多將璽印與憑信天然直接地聯繫起來，因而認為是進入封建制以後社會關係變化和階



奇字璽

級壓迫的產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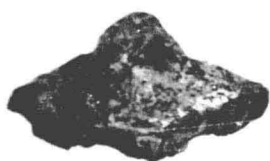
古文獻見載璽印的使用，時代可以上推到西周和春秋。《周禮》和《左傳》有「揭而璽之」及「璽書追而與之」的文字。這是作為憑信使用的記載。對於這些記載，人們仍然等待更有說服力的實物證明。

解決問題的關鍵之一，在於本世紀三十年代傳為安陽殷墟所出的三方銅璽是否可信，以及璽印在早期究竟屬於什麼性質的器物？

安陽三璽係黃濬尊古齋所獲，最初編入《鄴中片羽》，後又經于省吾《雙劍謄古器物圖錄》著錄。對此銅璽，持論矜慎者認為「三璽的出土情況不詳」，「我們為對歷史負責，暫不肯定它的時代」（沙孟海《印學史》）。有的學者運用文字學和形制學的方法進行深入研究，得出銅璽為「殷代之物」的結論。已故美術史家、印學家溫廷寬教授在其撰於五十年代的《印章的起源和肖形印》和六十年代的《璽印探源》中，認為印章「是一種複製文字形象（或圖畫、雕刻）的獨立小型工具」，並將其與「璽」字考釋相結合，提出「璽印作為代表官職權力、私人徵信之用和銅器、陶器銘文及花紋之用是並存的」，因而，「璽印并非始於戰國，在

殷之際就已經出現」。一九八六年，溫廷寬先生來滬期間向我談起殷墟的三件銅璽，他說尊古齋得到的這三件銅璽的來源、經過，他在解放前向當事人作過比較具體的調查。他認為出自殷墟是可信的。他結合銅器銘文對此作了比較詳盡的考釋。在《璽印探源》一文（一九八〇年正式發表時被編者改作《漫談璽印》）中，他所闡述的璽印定義和璽印起源觀，被國外學者認為是「具有潛在發展性」和方向性的研究方法和理論。

一九八四年，鐘雅倫（Robert A. Jones）博士在《先秦古璽與西方印章比較研究》一文中更加具體地以出土陶印模與印章起源相聯繫，支持溫廷寬先生的看法。一九九三年，李學勤教授發表《中國璽印的起源》，他也依據商代銅器銘文考證「亞羅示」銅璽為商末之物，他還認為「看商末古璽的製作已較成熟，其淵源仍可上溯」，「古璽有可能與陶拍有關」。在此之前的一九八七年，台北故宮張光遠教授曾撰《商代晚期兩枚銅印考》，就安陽三璽中的奇字璽和「亞禽」（即李學勤所釋的「亞羅示」）璽時代作出詳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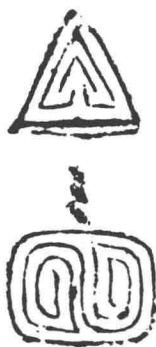


亞羅示璽

論證，認為「確為晚商無疑」。

筆者認為，除了前揭諸說的種種依據外，銅璽形制演化序列也應是判斷的關注點。表明安陽三璽為晚商之物的另一佐證是其鈕式的時代特性。三銅璽中奇字璽僅在薄平板狀印體上鑄一圓條形捏手，印臺與鈕身幾無過渡處理，這與安陽商代婦好墓出土的銅鏡穿鈕是一致的，而較之戰國璽印則顯為原始。從齊家文化到婦好墓再到西周，銅鏡的穿鈕形式與銅印頗具平行比較的意義。

晚商使用璽印的實物依據是殷墟發掘曾獲半片抑有印記的殘陶（見黃盛璋《我國印章的起源及其用途》），其文字雖不完整，但出於抑印則很明確。這樣，近年考古界對安陽殷璽的看法亦即璽印起源不晚於殷商的觀點，傾嚮已漸趨鮮明。問題的階段性結論最終劃上句號，只剩下一步之遙但又是至關重要的一步：連結晚商與春秋戰國間的缺環——西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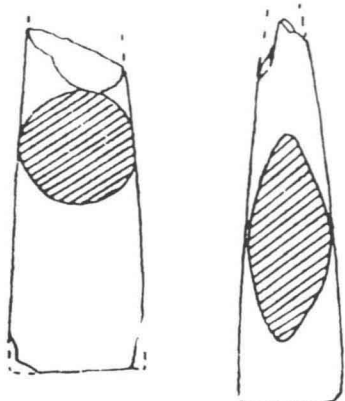
陝西扶風雲塘村出土西周銅璽

璽印的發現。

一九八〇年後，陝西扶風縣先後在周原遺址西周晚期灰坑中發現兩枚圖紋銅印模形式的璽印，它的紋樣，仍表明屬於工具性質而與憑信無關。在此報導發表之前，我們因鑒選「中國歷代印章館」展品，也發現了一枚西周的銅質火紋璽。此璽印體極薄，鼻鈕粗簡。印面為單個火紋，火紋的形式與殷墟晚期罍鼎口沿的火紋相類，與西周孝王時期的盞尊



西周火紋璽



湖北香爐石遺址出土西周初年陶印

上的火紋也很接近。結合多方面的特徵來看，此璽應是西周時代的印模。最近，湖北清江香爐石商周時代遺址的發掘報

告又刊佈了人們期待已久的消息：該遺址西周時期的堆積中出土兩枚陶印（見圖）。據其印文和長形把手的特徵，可以看出當是用於抑印陶器之類的戳記。此種長條形把手的印鑿（戳），也是中國璽印早期形式之一。直至戰國的陶印戳和銅印鑿仍因循着這種形式。這樣，我們可以認為，中國早期璽印的基本形制大體分為兩大類型，即供捉捏的有穿孔的鼻鈕式和供把握的長條（柱）式。

這些發現，不僅填補了西周璽印發掘品的空白，有力地支持了中國璽印起源上溯自商代的認識，而且進一步提示，璽印作為憑信的功能是後起的。這一點，與世界其他區域早期印章的性質相同。我認為這是問題的一個關鍵，即中國古璽印在早期是一種工具性的印模，後來在相當長時期內它又承載了作為官私憑信的功能。在中國印章發展過程中，這種憑信功能占據了主要的地位，因此，它的原始功用反而被掩蓋了。但它的憑信功能最終仍將退化。在篆刻藝術的範疇內，這種功能目前已經極為薄弱，便是明顯的事實。因此，認識璽印起源，須要解決一個基本的前提，即璽印的根本性質是什麼。然後再來回答兩方面的問題：一，作為抑印圖紋、文字的特殊工具，出現於何時；二，從什麼時候起，璽印承載了作為官私憑信的功能。而這兩個問題，經過近年的研究和討論，結合新發現的實物，結論已比較清楚。附此說明，西周璽印的發現還表明，中國璽印在初期階段已具有獨特的形制體系，過去有的外籍學者認為中國璽印源自古巴比倫地區蘇美爾人陶製印章的看法，現在應當作出修正。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古陶瓷印述略

兼論璽印的早期形態

中國古代金屬印章的早期形態，目前可以見到的是傳為殷墟出土的商代銅璽。按照器物發展的一般規律，在此之前或同時存在陶質璽印，是完全有可能的。新石器時代出現了用於陶器上拍印紋飾的工具——陶印模，與璽印的初始功能是一致的。這些陶印模，我認為最值得注意的是河南永城造律臺、徐州高皇廟所出的鼻鈕印模。從形制看，顯然與後來的璽印的形制及使用方式是一致的，即：具有印面、印臺、印鈕三個要素並確定地用於抑印，它與用於拍打紋樣的陶拍在形制上和用法上尚有微小的不同。但這微小的不同却使它



河南永城造律臺出土陶印模

有可能直接演進為後來具有示信功能的印章。

西周的陶印戳，最近已有報道。湖北香爐石遺址的西周時期堆積中發現兩件「陶璽」，形制近同於楚地「郢再」銅璽，應是抑印銘記的陶印戳。

戰國陶璽的遺存，已有若干可以認定的實物。它們的文字，明確地屬於戰國璽文的風格。民國時期周進所輯《魏石經室古璽印景》著錄所謂「泥璽」數件，其中「司工」今藏



司工(陶) 戰國



梧成右尉(陶) 漢

上海博物館，經筆者驗看，實為陶質。此璽印體如方柱狀而不甚規整，形制亦更接近於「郢再」銅璽，有穿孔，應是製陶的印記。三十年代，山東孫文瀾亦獲一枚六字陶璽，錄入《古陶文釋》中，其後又有數枚發現於臨淄。這類戰國陶璽，多係陶工所用的銘記。當此之時，銅質的官私璽印已廣泛使用並在鈕式形制、使用方式和功能方面完全定型成熟。

顯然，這些陶璽是苟簡的形態，這與它仍然停留在一般製作生產領域內作為完成產品的一個工序的用具地位有關。同時，也啟示我們，這些陶璽乃是前述原始陶印模的孑遺（當然在形式方面已有演變而更與所製作器物相配合）形態，早期陶印模的功能，它們仍然保留着。從抑印紋樣到抑印文字形態的工名、官署名於器物，它們在具體內容和形制上有所擴展和變化，直至出現金屬印模，但其作為工具性的一面，卻沒有根本變化。這是陶印模演變的一翼。陶印模的另一發展方向與陶器演變的一般方嚮相似，即向着器物（這裏指終極性的產品）轉化，基本離開生產領域，並且也被金屬等質料所代替。這是由於這種工具具有可以抑印複製固定的紋樣、文字的特性，當社會需要一種既可複印固定的文字，同時其本身又可驗示的特殊憑信時，人們便很自然地選擇了印模，並在形制上作出適應性的改進，隨之其性質轉變為器物性為主而附帶工具性的功能，後者即是一般完備意義上的璽印。先秦時代具有憑信功能的還有符節之類，但它們僅能驗示却不具備複製文字、留下憑記的功能。顯然，抑印、複製功能是璽印作為特殊憑信物的個性。後來盛行幾百年的封泥方法，是璽印由印模演進而來的歷史胎記。我認為中國古代璽印形成的路徑大體如此。人們津津樂道於印章起源時舉出種種用途和方式，都不是實質性的指嚮。但從工具性和器物性這一提綱出發，却又能將種種用途和方式串連起來，從而印證中國璽印由工具性向着器物性為主演變的結論。陶印模發展後一翼的實物例證可以由安陽商璽——周原西周圖形璽——春秋戰國圖形、文字璽構成與其相聯接的基本綫索，而

前兩者仍然屬於或者部份屬於印模工具性質，它們是陶印模向着銅質信驗性質的璽印演化的過渡階段。這個過渡階段經歷了漫長的時期。

這是談到早期陶印出現及其功能時不能回避的問題，因此在此一談。

陶印保存為難，故傳世罕睹。有的陶印長期被人誤定為封泥。如《封泥考略》中陳簠齋所藏「口黃口」、「天帝煞鬼」等數件，其鈕為羊、蛙等。今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按其有鈕這一特點，即可知不為封泥而是泥陶殉葬用印。存世漢代陶印亦有偶然發現，據其文字形態，也屬殉葬明器。實用陶印的餘緒，延續至唐代。唐陶印多為官印。一九七五年甘肅甘南發現唐代「蒲州之印」，印面五·五厘米見方，



蒲州之印(陶) 唐



尚書兵部之印(陶) 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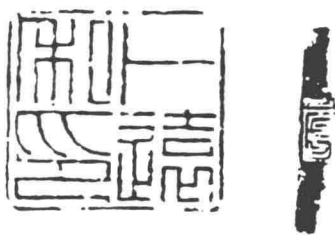
與唐代銅質官印尺寸相同。印文雕刻很深，也與銅質官印相似。一九八一年陝西榆林縣馬合鄉又發現陶質兩面印，印文分別為「夏州都督府印」、「銀州之印」，皆屬官署之印。

此外，傳世尚有「相州之印」、「尚書兵部之印」等。這些陶官印，流行的看法是殉葬所專用。但古代州郡縣官印，自隋唐以下改用官署印為主，代替了戰國、秦漢時形成的職吏印，公署印前後承傳，不為某官員專屬，製作公署印殉死，於理不合。因而殉印風氣，代有不同。北朝及隋唐時代盛行墓誌，官吏升遷行狀，皆銘載於誌中，而不像秦漢魏晉時須以官印殉葬表明生前官職，故近幾十年發掘唐宋墓少見以官印隨葬之例。這些陶官印的性質，看來現在還不能明確地作出定論。

明清紫砂工藝盛行，製作紫砂印成為江南文士的雅玩，它們的性質，已與早期意在實用顯然不同。上海博物館藏有明末篆刻家顧聽所作的瓦鈕紫砂印，頗具漢魏風範。印文係鐫刻而成，而非燒製前鏤於胎上，故特有蒼莽之趣，極見作者功力。顧聽字元方，吳縣人，以善治晶玉名世，但傳世作品僅見此一件，彌足珍貴。清代宮廷亦尚好砂器，工藝上更為刻意，講究細膩奇巧。我曾見一九九四年翰海拍賣的一件晚清製作紫砂印，鈕式雕為古象，渾樸的造型與局部的精細處理相得益彰，堪稱此期紫砂陶印的代表作品。筆者還經眼過清末民國書畫篆刻家金城（鞏伯）所製的一紫砂瓦鈕印，形制倣自魏晉官印，印文古樸渾厚，此印今亦入藏上海博物館。由此可見，古代陶印延綿至明清，已納入文人篆刻的軌跡，作為印人、文人們標新立異、取資賞玩的藝術品式了。

瓷印的出現是與唐宋製瓷業繁榮相伴而生的。明代印學家甘暘曾說：「上古無瓷印，唐宋用以為私印。硬不易刻，其文類玉稍粗，其制有龜鈕、瓦鈕、鼻鈕。」（《印章集

說》）甘暘看來是過眼不少唐宋以下的瓷印的，從目前可見的遺物來看，他所說也是符合實際的。我曾見到一方楷書「龍」字青瓷印，印背四沿成圓弧形，此種形態具有較早期印臺的遺風，據殘存鈕座看應為鼻鈕形式；又結合印文書法和瓷胎判斷，風格屬北宋無疑。宋元時瓷業發展迅速，製作瓷印在工藝上較之銅印的鑄造更為便利，取材也低廉，故此



顧聽印(紫砂) 遠卜



龍(瓷) 北宋

期景德鎮窯青白瓷私印較前代發現為多。青白瓷印的文字均刻胎後燒造，筆畫深凹，尤以兩宋為甚，是鑒別上的標識之一。此期瓷印出現了鈕式雕鏤精好、印文書法工整的上乘之作。它既是當時瓷藝發展臻於成熟的表現，同時又受到同期印風的深刻浸潤，因而它所透露的信息便具有綜合的價值。南宋「柯山野叟」係上海博物館藏品。此印形體規整，施釉均勻，印文採用當時流行的九疊篆，筆畫挺勁平正，是少見的精品，楷書入印是宋元時代盛行的風氣。珍秦齋藏龜鈕「沙隨程迴」印，書法謹嚴，一如刻碑程式。此印印體碩大，達四·七五×四·六厘米見方，亦是宋代瓷印中不可多